

乡土重建

经典作品集

费青通



深刻认知与精妙分析中国乡土社会内生机理的巅峰之作。 CTS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重建/费孝通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6
ISBN 978-7-5561-2906-5

I. ①乡… II. ①费…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39269号

乡土重建

XIANGTU CHONGJIAN



领读文化传媒
LINGDU Culture & Media

著者：费孝通

选题策划：领读文化

产品经理：领读-张睿宸

责任编辑：陈实 田野

责任校对：夏丽芬

装帧设计：卿松[八月之光]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nppp.com>]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电话：0731-82683313

印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22年6月第1版

印次：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7.5

字数：133千字

书号：ISBN 978-7-5561-2906-5

定价：49.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用文字照亮每个人的精神夜空



微信 | 微博 | 豆瓣 | 领读文化

总序

一个重读费孝通时代的开启

赵旭东^①

2021年11月2日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日子，作为一种纪念，也作为一种学术的传承，我们特别编订了这套八种十二卷的“费孝通文存”出版，以飨读者。编书也是读书，编过之后，总会留下那么一丝印记，这便是写在这里的有似蜻蜓点水一般的读书心得，并以此作为将来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的引子。如能因

^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此引起同好的批评，那也是一件很让人快乐之事。

· 选书缘由

在有着书写能力的文人传统中，有独特的文人纪念的方式。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是将老师费孝通首先看成一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能书写的文人，其次才是一位做研究的学者，最后则可谓是一位真正有着基层社会关注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思考来自他四面八方“行行重行行”的行走，而他思想的精髓则见之于他一篇篇的文字书写。

对于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我们实际上很早就筹划着，包括一直在编着的先生年谱长编。这中间我曾经尝试着和出版社的朋友进行沟通，并一起详细讨论了出版这套文存的初衷、构想和规划，没想到一拍即合，默而认同。大家随后便在一起合作，从选书到选版本，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最后选定了八种十二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专门为着纪念而选出来的文字，在费孝通一生的作品总目中，既有很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以及《乡土重建》，也有那些似乎不那么著名的，或者不那么具有特别代表性的，比如说《美国与美国人》《重访英伦》《社会调查自白》以及杂写五种的《杂

写甲集》《杂写乙集》《杂写丙集》《杂写丁集》和《杂写戊集》。将这些编订成一套文存，最为朴素的初衷就是，试图以此作为对这样一位一生以“一介书生”自居的世纪文人的独特的纪念。

当然，在我的观念中，费孝通的这些作品都可谓是著名的，并且必然都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很难专门有一种所谓学科史意义上的那种刻意地去做出著名与否以及代表性与否的一分为二的划分。即便是对一个普通人而言，非黑即白的评判也是会失之偏颇的，更别说对一个真正的有思想的文人以及有知识和品位追求的大学者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区分，很显然是一件极为荒诞也无意义的事情。

自然可以想见，作为思想家的费孝通，他自己绝对不会有分身术一般的能力，将他一部分灵魂和精力，去写所谓著名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分出另外一部分灵魂和精力，去写非著名的和没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显而易见是一种不大合逻辑，甚至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的武断的划分。而反过来却又可以说，费孝通有生之年所写下来的这每一个字，实际上都代表了费孝通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可谓是他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可以借之去洞悉费孝通思想的根本和全部的。

· 费孝通的思想

单就费孝通的思想本身而言，它实际上真正标定了一个时代的存在，并无形之中映射出来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他用一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以及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个人、社会与文化思想的理解。甚至还可以说，他一生的书写，真正完整地体现出了中国文人传统之中独有的文以载道的“公器”观念，从日复一日的文字书写之中，他的思想和个人知识的发现，也必然因此而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而费孝通文字的魅力，恰在于最为真切直接地去关注现实中国本身的实际存在样貌。他从来没有以学问的深奥来将自己隔离于大众群体的生活现实之外。他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一种平民路线，强调基层精英与大众生活之间的无距离的沟通联系，因此才会有他的“从实求知”以及“志在富民”观念的提出。

在这里，很显然的一点是，尽管他早年曾经深度地参与历史学家吴晗有关中国绅权问题的讨论，并一起编写了《皇权与绅权》一书，由此真正注意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上下结构间作为中间层的士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但他的绅权观念是基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观察，是将士绅角色及其权力运作还原到乡土社会结构的功能之中。因此，他的观察视角是源自乡

土又回归于乡土的。

而且，费孝通对于“土”的理解是极为独特的，也是后来人如果不去专门做一种深度阅读便无法真正体会得到的。这种理解是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英国人类学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也即真正把“土”或“土地”以及依赖于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基层社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中间，土地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媒介和根基而存在着的，也就是在乡土观念中的个人、土地以及社会这三者，它们必然是相互绑定并勾连在一起的，彼此间是无法分离，也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

显然，从作为其第一本专著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到后来名冠天下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这个阶段，可谓是费孝通思想成长的关键期。这同时也可以看成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觉醒，是西学遭遇到中国现实社会的一次真正自觉、自求和自知的本土性转化。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觉醒，对费孝通自己的学术历程，乃至学术思想的形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因此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笔记性随笔的书写之中，即不再在西方严格学科规范下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约束的一种自由体的写作。并且，还基本上塑造了其在这之后的可以随时随地秉笔直书发表议论的、中国文人传统中他最擅长和流行的、

能够作为公开意见发表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文化担当的一种书写。

· 费孝通的书写

费孝通的基本写作模式往往是随手写下来的文字先成为篇，然后将篇编订成书，并且是持续地书写，笔耕不止，甚至有着“文章不过夜”的习惯，这种习惯差不多一直保持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他一笔一笔的书写最终成就了他的一篇一篇文章，也自然成就了他的一种又一种独特思想。在此意义上，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费孝通思想”，便是由他留下来的一篇篇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①，其思想的闪光之处，都体现在由其笔端所书写下来的成篇、成章以及成书的文字之中。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不会拘泥于文字书写形式本身，而是尽可能地让一种思想自然而然地伴随着一种文字和思想间的联想而起伏波动、延绵不绝。

① 参见拙著《费孝通思想的三重品格——论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学科意识在中国之成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49—60页。

很显然，他长久坚持下来的散文体的学术论文，让文字的书写不再是福柯所谓“知识/权力”关系下用来震慑人、威吓人乃至伤害人的工具，而是和蔼可亲，有如闲聊家常一般的彼此间的对话、相互间的启示以及意义上的阐扬。而这种文字的创作，是非要真正对文字本身见之便“心生欢喜”之人，才能有的对作为一种载体和媒介的文字背后所独具的魅力的真正体味和感悟。

他在文字书写上的率性以及文字表达本身的朴素追求，无形之中也成就了《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即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这本书的文字及其内容的韵味依旧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此书一版又一版地重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新一代人的阅读目光就是一个证明。在这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近乎不朽的生命力。除此之外，《乡土中国》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一个人随时可以去读，没有那么多看似高深抽象的前设以及掉书袋一般绕弯子的烦琐文献考订，而是以文字书写直接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中国本身，即一种乡土中国的存在及其变迁和转型，由此启发更多学者的思考以及问题意识的不断涌现。

对费孝通而言，他基于文字提出的问题，往往都带有一种观念上的柔性而非刚性的思考，因此便为后人多重性意义的解

读留有一种可滑移的空间。由此其落笔所写下的那些文字，凭借着这样一种内在的柔性和滑移空间，自身便带着使人易于接近的亲切感，并且在这亲切之中又隐含着敏锐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在这方面，也许这套文存所选出的任何一篇费孝通的文字，都可以用来作为起点，由此渐渐领悟作为整体的费孝通思想的核心及其全部的风景。

除此之外，费孝通的文字风格也是多向度的，从一种扎实细致的学术探究，到自由随性的游记、杂写以及满怀深情的纪念怀故的文字，还有一首首的诗篇吟唱，这各种形式的呈现，实际上都深刻地体现出费孝通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核心意义，那就是在对文字予以一种敬畏之余把文字作为公器的自我意见的表达和书写。

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字的生命和某一个具体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却又不是可以用简单的“盖棺定论”来对其全貌予以准确勾勒的，而是要有阅读者和研究者不断深入阐发，其意义才能真正地显现。同时，费孝通自己文字的柔性，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门槛的阅读上的直白以及这种直白背后的诸多可联想性，也为这种意义的解释和阐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空间。

很显然的，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所写下或所留下来的文

字，以及可以对此去做进一步意义阐发的任何一扇门关死，而是任由它们随意地打开着，使后来的人们基于他富有启示性的运笔，而有了一种极为丰富乃至无穷的想象力的涌现。换言之，费孝通的文字终究是可以用来读，可以用来想，甚至是可以用来启迪人心的。

· 费孝通的乡土观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背景，我才和编辑们一起精心从费孝通生前出版的文字中选择了这十二卷本的文字，集成这套“费孝通文存”。而从对这套文存字里行间的阅读之中，我们可以真正窥见作为文人学者的费孝通在文字写作上的一生，及其背后所运思的无限的学术创新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发挥，或许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性和创造性存在提供一个后来者借鉴的样板。

很显然，思想跟文字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意义上，一部人类书写史，也是人类思想逐渐地从粗鄙到精致的自我演进史。文字自身所能提供的独具魅力的联想和想象力，为文化的传递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媒介载体。在这方面，费孝通自己的学术生涯便是以一位自愿书写的写者

开始并坚持一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见其《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他写作生涯中最早变成铅字的，便是他十四岁时所写下并发表在当时商务印书馆《少年》杂志上的一篇讲述秀才先生闹剧的文字，而这种故事书写的模式也几乎是贯穿其一生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费孝通自己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类学家。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乡土中国》，甚至这里所选的其他各类著述，这类故事性书写都暗藏在其各种形式的文字表述之中，因此也可以随时拿来阅读，并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去做一番实际分析。

在这套文存里，所选定的第一本《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英国求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这恐怕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依循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而撰写的一部专论式的民族志作品，但仍不失是一种故事性的存在。这本书的成名，特别是世界学术界的认可，倒是费孝通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他因此说这是一种有似“无心插柳”的不期而遇^①。但《江村经济》一书背

^① 费孝通在1985年《江村经济》的《前言》中写到“屈指一算，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时，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费孝通，2018年，《江村经济》，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第5页。

后的故事性却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必然存在，或者应该说是在费孝通与江村的一次恰巧的偶遇基础上而实现的，这一点也成为此书撰写的基础和底色。对于这一场注定要发生的偶遇而言，更为根本的，或者更为真实的，便是他的姐姐费达生（1903—2005）早于费孝通的调查而在吴江开弦弓村所开展的一系列乡村工业实践活动，那个故事本身便可以说是委婉动人的。之所以这中间又能够跟费孝通有所关联，那显然是跟费孝通在那个时期的一段极为特殊的个人生命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人会用所谓“家乡民族志”的概念去理解《江村经济》一书，甚至将费孝通看成这种民族志书写的开创者之一，但无疑地，江村对费孝通而言，并不是“家乡”这个词语的表面意思那么简单——这是费孝通自己在大瑶山痛失爱妻王同惠之后的一处身体以及精神的疗伤之地，也是他所敬佩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1880—1969）为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而进行的乡村工业化的试验实践之所。他作为江南士绅家族后代无意识地觉察到了家乡本土的顽强地依赖于土地而谋生的人们，他们原有的本乡本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转变，这种转变显然来自西方强大工业化的冲击。

马林诺夫斯基曾为此书专门写序，认为这是一部“里程碑

式的著作”^①，这样的盛赞也并非一种虚言，因为西方人类学在遭遇西方以外文明世界时的发展困境在这里似乎有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求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东方文明世界里的乡土社会，在面对西方现代化强势冲击之后而朝着积极面创造性转化的典范性案例。似乎，对马林诺夫斯基这位世界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从西方世界对现代世界冲击的无以适应的绝望中，真正看到了东方大地的地平线上那一道闪烁跳跃的曙光。江村因此便是世界性视野中一个本土人类学的研究者所讲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世界文明中将会如何发展的一个极好的本土研究范例。这个范例背后的故事性无疑是生动感人的，而且是最为真实可靠的，是熟练于社区研究的费孝通亲自调查而得，并借此唤醒了在绝望之中挣扎的西方人类学家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换言之，从西学意义上，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西方人对于西方以外异文化的书写，而是本土研究者去自己的民族或人群当中进行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的开拓。这中间少了文化间

^①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写到“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2018年，《江村经济》，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第1页。

的隔膜，而更为具有了在自己人民之中的设身处地的深度理解和体悟。由此，本土人类学的开展，也便有了其最具合法性的一种存在可能，人类学这个学科，也因此走出了西方占据主导话语权的观念支配，而日益走向可以真正实现费孝通理想的那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编入文存的《生育制度》一书，可谓是费孝通作品中最理论化的一本了，它是基于费孝通抗战时期在云南大学上课时的讲稿而写成的，最初发表在1947年。这本书关注西方的亲属制度研究，因此也会与既有的西方人类学亲属制度的原理有更多的关联性，或者不如说这是从中国人的家庭观中对亲属关系的理解去重思西方亲属制度这一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因此，曾作为讲义稿的《生育制度》一书，不失为一部真正从对中国亲属制度的观察出发，重新审视西方亲属制度研究在中国的适用性的著作。

很显然的，在由《生育制度》所引发的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之中，费孝通加入了自己从谱系学意义上而言的“社会继替”的观念，他因此有了一种基于中国家庭关系实践的更具延展性的讨论。而这在西方，要么是去强调一种家族联盟的结构，要么是去强调时间系谱上的代际结构分析，而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则独占一种中国式的以家庭为重的，家庭中父、母、子三角结构及其代际传递的解释视角，这显然跟那种更为重视